

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

宋 镜 明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击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后来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吴佩孚再起后为什么又能立即与张作霖结成反革命联盟?直奉军阀是如何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概述。

一

吴佩孚是在反奉运动的怒涛中,打着反奉的旗号东山再起的。

北京政变后,代替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政权的临时执政者,名义上是段祺瑞,但这时皖系的势力已瓦解,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已受排挤,实权则控制在奉系张作霖手里。奉系军阀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和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从而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因此,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告全国民众书中,号召“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①,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受奉系军阀扩张压迫的各省直系军阀,企图利用人民的反奉气势,联合起来对抗奉系,以便重振旗鼓。曾被打垮、几经周折、退往岳州(今岳阳)的吴佩孚,更是蠢蠢欲动,伺机东山再起。

并伙同顽固派共同抵制维新变法思潮的勃兴。这时,洋务思想便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的历史作用由进步走向反动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作者将另文论述。

注释:

- ①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五册,第529页。
- ② 张之洞:《劝学篇·益智》。
- ③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81页。
- ④ 《重刻〈海国图志〉叙》。
- ⑤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六册,第149页。
- ⑥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 ⑦⑧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五册,第119页。
- ⑨⑩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1页。
- ⑪ 《使西日记》,1981年版,第24页。
- ⑫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卷四。
- ⑬ 《欧美环游记》卷三。

- ⑭ 《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
- ⑮ 《弢园尺牍·答包行洲明经》。
- ⑯ 《校邠庐抗议》卷下。
- ⑰ 《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
- ⑱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 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 ⑳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
- ㉑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34页。
- ㉒ 沈纯:《西事彙测》第八,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 ㉓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

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驱逐了长江流域的奉军。这一形势，造成了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吴自己也认为出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肖耀南的意见。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肖耀南召集陈嘉谟、寇英杰、刘佐龙、张联陞、孙建业、杜锡钧等开会讨论时局。十八日，通电响应孙传芳，共讨张作霖，并率鄂军全体将领电请吴佩孚“早日命驾”^②。接着，孙传芳、肖耀南、周荫人等二十一人也在二十日致电吴佩孚，请其出山，组织联军，共讨奉张，并推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于是，吴佩孚于二十日乘决川舰离岳州赴汉。行前，他发表通电表示要“随同诸胞泽，匡救国难，共策澄清”^③。途中，又在舰上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斥“奉张肆其野心，段祺瑞公然卖国”，自称“受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推戴，当然担当主持军事的责任”，并谓“俟军事解决后，仍恢复法统，依据法律，解决国内一切纠纷”^④。

二十一日，吴抵汉后，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于查家墩，并通电全国：“谨于十月念一日在汉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⑤孙传芳等人的联名推戴电也同时发表。然而这个电报的列名者岳维峻、孙岳等事前并未同意，其余有的只是由代表签名，还有杨森等则是下台军人，起不了多少作用。更有甚者，孙传芳占领徐州后，就公开请吴佩孚主持东南五省以外的事情。因此，吴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实际上是自封的，他的最高统帅地位也是不稳固的。

吴佩孚通电就任总司令职的同时，还委任了司令部所属八个处的处长，并发表对外文告，宣称尊重一切条约，保护各国侨民，希望各国在战争时期严守中立。不难看出，此时吴佩孚虽然摄于上次失败的教训，一时还不敢答应吴景濂之流挂出“护宪军政府”这块招牌，但他力图把自己的司令部变成一个“中央政府”的组织，以便与北京临时执政府分庭抗礼，则是显而易见的。

当晚，吴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抽调一师两旅会攻徐州，任肖耀南为联军司令，还任命了各路司令，“观其措施，依然当年北京登坛拜将神气”。^⑥

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在表面上虽然倡言反奉，宣称“誓歼戎醜，为民请命”^⑦，但实际上，不过是想借此机会恢复其旧有的势力和地盘，而且他攻击的主要矛头、讨贼所指的真正含意并不是奉系张作霖，而是段祺瑞和冯玉祥。他到汉口后，首先发表言论斥责段政府“毁法乱政”，标榜自己为“护法”而来，并以恢复“法统”作为解决时局的根本方针。他的所谓法统就是指曹锟所颁布而为段政府所废止的“宪法”。同时，他不肯接受孙传芳的邀请赴宁主持讨奉军事，而在假道攻奉的幌子下，准备出兵进攻属于冯玉祥势力范围的河南，这就同直系各督拥戴吴出山联冯讨奉的目的大相径庭，形成吴与直系各督同床异梦的现象。

二

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反奉转向联奉反冯。

冯玉祥深知吴佩孚图报旧仇的真实意图。这时，冯虽战胜李景林取得了直隶地盘，但是，直鲁联军在鲁北准备反攻，郭松林又兵败被杀，奉系张作霖的报复已在所难免；阎锡山对国民军的敌意也很深。这样，国民军的处境就异常困难。加之，冯推荐孙岳任直隶军务督办，又引起了国民军内部的深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借以削弱军阀联盟，防止直奉联合；同时，也为了缓和国民军内部的矛盾，加强其团结，便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联盟的压迫与“反赤”宣传的恐吓下，由动摇、妥协、终至再次下野。

然而，冯玉祥下野，国民军群龙无首，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合。

当然，从根本上说，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是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由英、日帝国主义策动而成的。

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春，全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当时，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统一，北伐战争正在加紧准备之中。在北方，反奉倒段运动不断高涨。北京爆发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声势浩大的大示威，特别是爆发了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执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京人民的反奉倒段运动。不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明显激化，而且军阀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虽遭失败，却给了奉系军阀及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天津打败了奉系部将李景林，占领直隶全境，与河南地区国民军联成一片。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大为恐慌。在南方，英国通过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的喉舌)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布了一项进攻中国的计划，宣称用十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每日军费十五万英镑，先拨六十万磅作为宣传费用，并扬言两年内可征服中国^⑧。英帝国主义封锁了广州海关，企图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还为吴佩孚进攻河南国民军提供大量枪械子弹。在北方，日本帝国主义更唆使直鲁联军、榆关奉军、山西阎军及靳云鹗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压迫国民军。当时，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无不攻击国民军“赤化”，甚至把冯玉祥当作“赤化将军”看待。因此，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初，便开始策动军阀奉张与直吴结成反革命联盟，使他们在“反赤”的目标下，共同进攻国民军和扑灭南方革命势力。这时的政治形势，正如《向导》周报一篇署名文章所指出的：“现在中国的政局，已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期，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英、法帝国主义在内)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战线，一致对付国民军、广州政府和民众之趋势。”^⑨直奉联盟的反革命目的“是先扑灭北方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以期实行全国之刷新。”^⑩他们企图扑灭整个中国革命，以造成全国巩固的反动局面。

奉直联合“反赤”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四年冬。那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刚结束不久，为了防止孙中山日益扩大的革命影响，张作霖乃派密使童好古到鸡公山拜见吴佩孚，煞有介事地对吴说：“螭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奉直联合起来，“天下无敌”^⑪。吴佩孚东山再起时，张作霖又以苏锡麟为密使到汉口，向吴提出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推举王士珍为总统作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张宗昌也派熊炳琦、童好古到汉口表示愿意退出徐州，请吴劝告孙传芳和平解决。尽管当时吴还不便把联奉讨冯的真心公开吐露，但吴奉关系的日益靠拢却是有目共睹。冯奉关系则时紧时松。吴对冯玉祥本来就有刻骨仇恨，冯部岳维峻反对假道河南使吴更加恼怒。吴的左右张其铨、齐燮元、张志潭等力主联奉讨冯。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的爆发则成了奉直联合对抗国民军的转折点。滦州倒戈前，郭与冯签订了反奉密约。滦州发难后，冯通电要张作霖下野。故张非常痛恨冯对郭的支持，此时，冯奉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张吴由于利害关系的一致，为了扑灭北方的革命运动，他们急欲联合首先共同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吴佩孚乘机致电张作霖，电报的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⑫自此之后，张吴之间，互派使者，来往密切。张派代表杨宇霆和吴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大体上成立了谅解”。^⑬奉系的重要人物张景惠还亲往汉口，“向吴表示张作霖之好意，且愿……嗣后与吴合作”。^⑭“嗣后张景惠与张志潭在汉口又会晤多次，渐次使合作成为固定。”^⑮吴佩孚也派吴天民、杜孝穆等人至奉，“商议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之计划。”^⑯从此，吴遂由讨奉，一变为讨国民军，汉口“查家墩讨贼军总司令部，应

改为联贼军总司令部了。”^{①⑦}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主张恢复约法，真是“昔日吴张二凶，势成对峙，战争不息，以苦吾民；今则二凶合并，并从事于祸国殃民行为”。^{①⑧}至此，原来互相敌对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联盟。“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进攻进步势力的局面。”^{①⑨}

三

直奉联合后，便立即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张作霖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魏所率郭留在山海关的残部已改编为国民军四军）为名，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目标一是滦州，一是热河。十九日，奉军占领九门口和山海关。二月二日，张学良由榆关进抵秦皇岛，国民军将魏部调至保定。三月二十日滦州失守，国民军后退。一月十九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也决定向河南进攻。二十日，吴发出通电讨冯。二十六日，命寇英杰由双河向信阳进犯。二月二日，吴佩孚又与肖耀南、齐燮元等联名通电讨冯。九日，李景林、张宗昌联名发出讨冯通电。十日，张宗昌、李景林分别就任讨贼联军鲁军、直军总司令，并推吴为各省讨冯领袖，而吴军攻豫前，吴奉两系进一步订立了同盟条约六条：“（1）吴军由京汉路北上。（2）直鲁联军由津浦路北上。（3）关外（指西北）由奉军负责。（4）奉孙（传芳）关系由吴负责疏解。（5）奉系帮助吴军军饷二百万元。（6）将来北京政局推吴负责主持。”^{②①}吴佩孚、张宗昌间，也订有密约，内容包括：（1）张宗昌部开往德州平原，及黄河以北直豫交界地方防御豫军。（2）靳云鹗部退往临城韩庄等处，反攻豫军。（3）李纪才部由王翰章部担任驱逐（王部原为第五师，在东平一带）。（4）王翰章、张培荣、吴长植所部军饷，月需四十万元，由张宗昌担任，嗣后该部及所驻地方政权，统归张宗昌主持。（5）泰安南，暂以由旧日鲁军驻扎，作为缓冲地带。（6）张宗昌仍以保安总司令名义，维持鲁局。（7）靳军饷项，吴张各任一半。（8）战事未接触以前，或在军事期间，军队势需经过双方防地时，须在三日以前，或事先互相通报，以免误会。”^{②②}“现在，国民军是四方八面受敌”^{②③}。奉张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接进攻东北，张宗昌、李景林与直系靳云鹗等联合对付在山东方面之国民军，并谋进攻河南；同时，吴佩孚已令刘镇华、张治公起兵陕西，扰乱陕西与河南西部，寇英杰等在武胜关亦跃跃欲试。“国民军在此种情势之下，已到了一个存亡关头。”^{②④}

国民二军岳维峻拒绝吴军假道河南并加强豫南后，仍继续实行他的攻鲁计划，兵分两路，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旬进攻山东。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进攻鲁南；另一路以李纪才任总指挥的国民二军主力，由归德进攻鲁西。

开始，战斗顺利。不到十天功夫，国民军很快就占领了临城、曹州、济宁等要地，前锋且进至泰安附近。后因吴派靳云鹗到徐州收回田、王、陈三师掌握了指挥权后，即暗中与张宗昌勾结，要他们按兵不动，因此，张宗昌得以集中全力反击李纪才所指挥的国民二军，李部乃退据兖州一带与鲁军相峙。

随着直奉军阀的联合，国民军在山东的战局继续恶化。冯玉祥下野时，曾议决二、三两军攻鲁，并推邓宝珊为攻鲁总司令，由马厂进驻沧州。后因河南局势的变化，邓部不久由津浦线调回京汉线北段，致使攻鲁之举陷于停顿。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张宗昌向退守大汶口以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田玉洁两部发动强攻。李、田两部又受靳云鹗部田、王、陈等师

的夹击，不得不退据济宁。二十二日，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在泰安会晤，议决靳军协助鲁军进攻鲁西，鲁军协助靳军进攻豫东，于是鲁军得以全力进攻豫军方振武部。自二十四日起，鲁军接连攻下嘉祥、巨野、曹州、郛城，方部退往大名，岳维峻将豫军调回河南。至此，国民军在山东的势力全部瓦解。

与此同时，国民军在河南也遭到了吴佩孚的致命打击。一月二十日，吴下令三路出兵进攻河南。东路靳云鹗军由鲁西进攻豫东；南路鄂军寇英杰部由鄂北进攻豫南；西路刘镇华、张治公由安康、襄樊率部进攻豫西。另外，吴还派人将河南各地的红枪会收编为豫卫军，使他们在省内到处与国民二军捣乱，实行内外夹击。

岳维峻接到上述情报后，即由开封赴郑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令蒋士杰师在信阳严加防备，并派田生春、杨瑞轩两旅增援豫南；命进入山东的李纪才部迅速回师豫东，田玉洁部移驻郑州，二军其余主力集结于洛、郑、汴间地区，以应付各方面情况。

当时，各方面的战况是：南路方面，蒋士杰缩短战线困守信阳达四十八天之久，寇英杰军屡攻不下。吴又加派刘玉春、宋大霈两部增援。迄二月中旬，蒋士杰、田生春、杨瑞轩等仍坚守不屈。吴见攻坚不利，于是变更战法，以一部兵力对信阳包围监视，抽出主力绕道北进，以断信阳后路。吴部于二月下旬，攻占确山、驻马店。三月一日，攻占偃城、漯河、许昌等重要城镇。岳部败军退集郑州附近。东路靳云鹗军紧随由鲁西退回之李纪才军进入豫东，于二月下旬陆续攻占归德、兰封。李纪才军继续西退。西路方面，刘镇华接到吴佩孚电令后，即率柴云陞、王振等部出荆紫关向豫西急进，张治公部由南阳向洛阳以西急进。阎锡山亦陈兵黄河北岸。“总之，此时国民二军已处于四面楚歌，三面包围之中。”^②

二月二十六日，岳维峻退出开封移驻郑州。次日，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迎接靳云鹗进驻开封。三月二日，岳军大部弃郑西退洛阳，一小部因北退直境。四日，靳、寇两部会师于郑，并向西继续追击。五日，阎锡山令晋军第一师商震部出娘子关取石家庄，堵二军北退。六日，岳维峻、李虎城、邓宝珊等退至洛阳之军队，“均为豫西红枪会所困溃散，李入陕，邓暂避民家，岳拟由晋逃，既入晋，被阎拘至宪兵司令部，伪称赵副官，半载始释。而退至河北之军队，亦同时溃散，国民二军仅弓富魁一旅辗转由津浦线，追随国民一军，退入居庸关。”^③由此可见，国民军在河南也被打败了。

四

国民军在河南、山东的溃败，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原因来说，是由于：

第一，国民军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自反奉战争以来没有向群众发表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因此，国民军内部不知为什么而战，群众也不了解国民军为谁而战，以致国民军不能团结一致，也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拥护。

第二，国民军内部将领之间意见分歧与军队的无纪律。岳维峻与刘允臣各成一派，互不相下。邓宝珊、史可轩等又称中立，在政治上、军事上均不能统一指挥，完全各自为政。至于行军纪律更是坏到极点。岳维峻则昏庸无能，信任吴佩孚之心腹马骥等，收养吴系靳云鹗部下之军队而不加以解决，养虎贻患。

第三，枪弹不足，经济空虚。国民军枪弹甚为缺乏，其中枪弹较足之部旅，每个兵士也不过二、三百发子弹。且各军队枪枝尤为不齐，除一部分尚用旧式之来复枪外，还有许多徒手之兵士。至于机关枪、迫击炮等，那就更少了。此外，经济空虚——兵士几个月未发饷，

而所吃的全靠向老百姓征取。“如此若图与挟有强暴之帝国主义者的资助饷械充裕之吴佩孚作战，自然立于失败之地位。”^②

国民军之所以失败，从客观原因来说，则是日、英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结果。当时，《向导》周报曾发表许多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命令山东张宗昌、李景林和吴佩孚派之靳云鹗等议和，相约共同出兵进攻国民军，等等事实，早已昭然若揭。^③吴佩孚在此次与奉张联合过程中，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指使，更是显而易见。当吴佩孚派吴天民、杜孝穆等人至奉天，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时，“便先至旅大，‘拜访儿玉关东厅长官、白川关东军司令，并绕道朝鲜谒见新藤都督，冀求日本援助，以期扫清东方赤化主义’（《新闻报》12月16日奉天通讯）。”^④吴佩孚与日本帝国主义、奉系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策略是：“日本帝国主义担任帮助奉张和吴佩孚之饷项和枪械……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指挥奉系军阀作战，在山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军队里，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差不多完全是日本人，并有法帝国主义者。”^⑤总之，“此次吴奉反攻国民军的联合完全是帝国主义在背后玩弄的把戏，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奉、吴的作战计划是东交民巷的英、日帝国主义制定的。在山海关方面张作霖的军队里，津浦路战线上李景林、张宗昌的军队里，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许多技术人才，如驾驶飞机、铁甲车，放机关枪、大炮、迫击炮等的人也都是日本人。靳云鹗的军队里也有大批的日本顾问。至于张作霖与李景林的一切军械军需，不用说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供给，并且还供给吴佩孚。英帝国主义也曾供给吴佩孚一万五千枝枪。但是帝国主义见以上各种对于奉吴的帮助还不能根本打击国民军，于是便亲自出马，公开的对付国民军。”^⑥

五

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在吴佩孚进攻河南的战争中，仅信阳一战“城内房屋大半毁于炮火，人民被打死万余人，饿死千余人，逃出者仅数千人，妇女被轮奸毙命者六百余人。”^⑦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人民群众团体一概受摧残，其群众领袖不遭惨杀便逮捕入狱。拒开封百里之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因反对苛刻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至四、五千人、大炮轰毁村庄十余，奸掠酷刑无所不至。”^⑧

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人民，也同样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之中。张宗昌残酷地压榨人民，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他征收的田赋，竟“征至民国二十八年”，其他军事特捐及各项苛税，“名目多至五十余种”^⑨，滥发的各种纸币、军用票、金库券不计其数。他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当时各地流传着“切切看看（把人头当作西瓜，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⑩这两句刽子手的黑话，就反映了张宗昌的统治是何等黑暗和恐怖。因此，到处怨声载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⑪人民群众对张宗昌的切齿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及其在河南、山东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因此，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的各界人民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实欲将民众势力根本打倒，以遂其直奉英日宰割之阴谋”^⑫，愤怒声讨吴佩孚“联张结匪、侵豫图鄂、极其残毒凶狠之暴行”^⑬。“反对吴佩孚进兵攻豫并继续反攻奉系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助长内乱”、“勉励国民

军团结一致始终与民众结合，打倒吴张”^⑨的呼声响彻全国各个角落。

注释：

①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448页。

② 参见公展：《东南风云与全国政局》，《国闻周报》第2卷第41期。

③⑤ 转引《国闻周报》第2卷第42期第15页。

④ 《申报》1925年10月25日。

⑥ 公展：《未来大战之酝酿》，《国闻周报》第2卷第42期第8页。

⑦ 参见《吴佩孚讨奉通电》，《国闻周报》第2卷第42期第16页。

⑧ 参见《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6期第1350页。

⑨⑫ 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还是民众的联合战线》，《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3期第1303页。

⑩ 雷音：《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向导》周报（汇刊）第4集第151期第1433页。

⑪ 参见冈野增次郎：《吴佩孚》，转引常城：《张作霖》第159页。

⑫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82页。

⑬⑭ 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第393页。

⑬ 《汉口已成政治中心》，《盛京时报》1926年1月29日。

⑭⑯⑰ 述之：《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4期第1312页。

⑰ 实：《联贼军总司令部》，《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38期第1260页。

⑱ 《国民政府对时局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5日。

⑲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吴佩孚讨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5期第1328页。

⑳ 转引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240页。

㉑ 《吴佩孚与鲁张之密约》，《盛京时报》1926年1月17日。

㉒ 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还是民众的联合战线》，《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3期第1304页。

㉓ 张钫：《国民二军与镇嵩军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㉔ 李泰莱：《国民军史稿》第326页。

㉕ 神州：《国民第二军之失败》，《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7期第1369页。

㉖ 参见秋白：《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5期第1331页。

㉗ 述之：《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向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47期第1363页。

㉘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241页。

㉙ 秋白：《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向导》周刊（汇刊）第4集第155期第1492页。

㉚⑳ 参见黄德昭：《张宗昌》，《民国人物传》第1卷第240页。

㉛ 《北京各团体勸国军继续讨贼》，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11日。

㉜ 《天津讨张反日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4日。

㉝ 《革命日志》（1926年2月）《新青年》1926年第4号。